

琼文抗日根据地地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虽有数千民众和党员被杀害，但仍抗争不止——

红色土地上的不屈脊梁

史料链接

根据地被日寇视为“眼中钉”，琼文抗日根据地战况

1939年3月中旬，独立总队第一大队在琼(山)文(昌)公路干线上的罗牛桥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汽车1辆，歼日军大佐指挥官以下20余人；5月，第二大队在海口市郊长村桥附近伏击修路的日军，缴枪7支；6月，第一大队化装潜入文昌县城，袭击日军北门哨所，歼日军数人。

日军遭独立总队连续打击后，出动1000余人对琼(山)文(昌)地区进行“扫荡”。为牵制敌人，独立总队以第二大队一部西渡南渡江，至琼山县龙塘、十字路、龙桥、府城和海口郊区活动，威胁敌人心脏地区，并将游击战发展到海南岛西部地区。

1939年2月至年底，第一、第二大队在琼文地区作战70余次，歼日军800余人，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画报跃进之日本》画册记录下侵琼日军在文昌附近扫荡的照片。本报记者 李英挺 翻拍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一笑

人们忘不了，70多年前，海南的英雄儿女在白石溪及周边与日军作战70余次，歼日军800余人，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然而，也正因如此，海口云龙、红旗、大坡、三门坡以及文昌部分相连的区域，由于成为琼崖抗日战略要地，而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三番四次遭受无情打击和摧残。

今年77岁的老人陈明炯至今仍无法忘记，日寇动用飞机、装甲车，向琼文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白石溪等片区划为“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但在艰苦残酷的反“蚕食”斗争中，琼文革命根据地的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一直是抗日



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黄一笑 摄

武装的坚强后盾。

处境艰难，随时有丧命之险

日前，冒着大雨，陈明炯在记者和东昌农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白石溪地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伸手抚摸那已红漆斑驳的碑文，上面镌刻着的烈士名单中，有他父亲的名字“陈文才”。

原琼山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万江告诉记者，白石溪地区主要指白石溪周边地区的树德、白石溪、中税和大坡一带，在土地革命时期属于琼山十七区，抗日战争时期归五区管辖，其中树德和跟它交界的文昌南阳，是琼文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带。

正因为是琼崖抗日的战略要地，白石溪地区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时刻酝酿对其进行无情打击。陈明炯的父亲陈文才，当时已是革命队伍的骨干成员，因知悉有风险，恐陈家绝后，陈明炯的哥哥陈明聪从小就被送到南洋的外婆家，直到海南解放后，才回到琼山和弟弟团圆。

而陈明炯则在白石溪老家数次经历死里逃生。“当时因父亲参加革命，很少见面，偶尔几次回家都是半夜悄悄回来，天还未亮又离开。”陈明炯说，他还记得，每次父亲回来，都会将一把随身携带的驳壳枪藏在草丛里，但这支驳壳枪在他和爷爷遇险的时候，并没能保护到他们。

1942年下半年，日寇动用飞机、装甲车，向琼文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白石溪所在树德片划为“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先是从空中轰炸，然后烧杀掠夺，

驻扎重兵，截击、屠杀抗日民众。在一次日军的“蚕食”行动中，当时只有四五岁的陈明炯，在睡梦中被爷爷一把抓起，然后拼命地跟着往山里逃窜。由于和他们一起逃命的乡亲们纷纷倒下，陈明炯不敢回头，只紧紧地跟着爷爷，后来实在跑不动了，爷爷就将他扛在肩膀上，途中经过一片荆棘地，慌不择路的爷爷赤脚冲进去，结果脚背被刺穿。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1942年5月开始的“蚕食”中，杀害琼崖百姓达10多万人，烧毁房屋5万余间，给琼崖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是琼崖抗日最艰难的阶段。

英勇抗战，粉碎日寇大扫荡

为粉碎日寇的“蚕食”，中共琼崖特委

1942年6月1日发出了《关于目前琼崖局势的指示》，领导琼文抗日根据地军民全面出击，积极开展游击战、反击战。在竹桥伏击战中，第二支队在副队长覃威指挥下，全歼日军一个中队，击毁军车两辆，缴获机关枪两挺，长短枪30余支和一批军用物资。同一天，第一支队在琼山二区伏击日军9辆军车，击毁三辆，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十多支步枪和大批军用物资。接连的胜利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信心。

短短几个月，琼山、文昌两县的区乡党员干部就在反“蚕食”斗争中牺牲了400多人。面对这种残酷的环境，根据地的群众没有一个人出卖民族利益，出卖革命，郭冠英、云四婆等一批“堡垒户”、“革命母亲”成为了革命的坚强后盾。

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反“蚕食”斗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琼崖特委和冯白驹率独立总队在坚持琼文抗日根据地反“蚕食”的艰苦斗争中，共击毙日伪顽军1200余人。在坡头尾村的一次战斗中，更是用步枪击落了一架日军飞机。

1943年3月，针对反“蚕食”斗争的新变化，琼崖特委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战略方针，重点把主力转向外线打击日军，开展新区工作，配合琼文抗日根据地内的反“蚕食”斗争。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的冯白驹在《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中回忆，“我们的主力便撤出琼文交界区，向澄迈地区移动，展开打击日寇，并且取得一定的胜利。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起着粉碎日寇‘蚕食’的作用，达到保卫琼文交界区根据地的目的。”最终，琼崖抗日军民反“蚕食”反“扫荡”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

评论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张成林 美编：张昕

对电动车应严治严管

■ 张成林

近日，海口公安交警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在电动车治理上取得了良效，违法行为减少了，路面更干净、顺畅了，大家的安全意识也进一步提高，这也再次证明，对电动车就须严治严管。

据报道，海口电动车整治仅5天时间就教育16000多人，被责令纠正人数达10000人之多，足见电动车违规行为之多、之乱。长期以来，占道行驶、逆行、闯红灯、违规载人、超标上路等电动车乱象屡治屡犯，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安全和秩序。另外，海口目前电动车保有量已达50万辆，且仍以日均500辆的增幅增加。电动车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俨然成为城市交通环境、道路管理的一大负担，倘若不严加管理，严格准入制度，电动车乱象恐将成为海口城市管理不可承受之重。

电动车严管就要加强源头治理，加大对电动车的生产、销售、改装环节的监管力度，对违法厂家和改装

海南观察之

天涯·论见

【新闻背景】

近日，海口市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初见成效，道路状况大为改观，市民在大加称赞的同时，就如何更好管理电动车纷纷提出建议。

有人认为，海口电动车保有量大，违法乱象多，已经成为道路交通的一大负担，对其必须严治严管；也有人认为，电动车在严管的同时还应通过优化服务进一步改善电动车的出行生态。

漫画/吴之如

严治同时服务要跟进

■ 饶思锐

当前，海口市对电动车违规驾驶的专项治理持续深入，从治理情况来看，电动车乱象之多、比例之大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引发了各界对于电动车出行的深层次担忧，有的市民提出应对电动车进行大力限制。笔者认为，对电动车违规行为与电动车出行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在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治的同时服务也要跟进。

首先，电动车出行不等于电动车违规驾驶，二者没有必然关系。相比机动车，电动车价格适中，且是一种更为绿色的出行方式，对城市空气污染较少，为许多市民所欢迎；其次，目前电动车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逆行和占道这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上，这固然与驾驶者的守法意识、安全意识直接相关，但与有些路段道路设施不全、路权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也不无关系；此外，目前海口市电动车保有量已达50万之巨，已然成为城市

来 论

安全事故
须防“水军”混淆视听

■ 易艳刚

这两天，社交媒体被湖北荆州“电梯吃人”事故刷屏。有人在那位不幸的母亲“点蜡烛”，有人在那追问事故原因和事故责任，然而，还有一类人在做一些不太光彩的勾当——他们涌向相关微博和媒体报道的评论区，用不同的账号，复制并粘贴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暗示事故是因为受害者不听劝阻执意乘坐正在维修的电梯所致。

在事故受害者家属的微博跟帖中，有很多人都在“爆料”说，当时工作人员已告知受害者电梯是坏的，正处于维修状态。事实上，荆州市安监局局长、包括当时在现场的受害者家属等，都明确表示“事发时电梯并不处于维修状态”。这样四处都有、整齐划一的搅浑水，不得不让人怀疑背后是有人组织的。有网友指出，这极有可能是雇佣专门的“水军”来捣乱的——尤其一些“爆料者”连微博头像都没有，此前也没转发或发布其他微博，更令人生疑。这些人通常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以拿钱帮人发帖回帖造势为生。

把舆论之水搅浑，模糊事件焦点，转移核心话题，淡化事故主体责任，是“水军”们的看家本领。就“电梯吃人”这件事而言，即便权威官方——荆州市安监局局长出来澄清说“事发时电梯并不处于维修状态”之后，那些混淆舆论的声音依旧像病毒一样在网上蔓延。与这起“电梯事故”类似，在以往的很多安全事故、媒体事件中，都有大量的“水军”出没。他们用各种注水帖将真实的网络民意“淹没”，进而有组织、有预谋地把控着舆论走向；在有些案例中，一些“能量”比较大的人，甚至可以一边发动“水军”灌水一边删除其他帖子，让舆论声音呈一边倒。

“逢事故必有水军”，是一种性质很恶劣的舆论乱象。一旦事件真相被“水军”混淆，民意就有可能被误导，事故追责也会受到影响。如果花钱雇佣“水军”就能逃避追责，事故责任人恐怕不会反思事故原因、总结事故教训，很多悲剧性事故也将因此重演。另一方面，“水军”猖狂地颠倒黑白，对于事件当事人及家属，不啻一种“二次伤害”。

逝者已矣，如果一条生命的消逝、一个家庭的破碎，被一些人以“花钱消灾”的方式糊弄过去，而不能换来应有的检讨、反思和追责，这样的结果将令人深感遗憾。在此，对于“水军”乱象，除了呼吁那些“赚脏钱”的人良心发现而“改行”外，更需要有关部门拿出对症的治理手段。另外，作为旁观者，我们起码可以做到，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多一些甄别能力，别太轻易被“水军”忽悠，努力发掘真相并让正义得以伸张。

“环保影响发展”老调应再纠纠偏

新华时评

■ 陈灏

新环保法实施以后，迅速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仍不乏一些人因为环保政策限制了部分“两高”行业、影响了地方税收而颇有怨言，也有一些地市因为采取强硬措施治污而被人指责。但是，大量成功的案例足以说明，环保与发展其实并不矛盾，两者是互

相促进的关系。

例如，山东的造纸业，可以说是环保促发展的典型。20世纪80年代，山东全省有1000多家小造纸厂，产生的废水化学需氧量(COD)非常高，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当中，导致山东境内但凡周边有造纸厂的河流都被污染，民怨沸腾。1995年前后，山东省采取了强硬措施，毫不留情地对污染严重的小纸厂进行关停。随后，山东省又出台了比国家标准严格数倍的造纸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倒逼造纸行业加大环保投

入。一时间，山东省造纸企业数量一路锐减到不足300家。

被关停或倒闭的造纸企业，其实都是各县的纳税大户，关停或“逼死”这些企业，也影响了一大批人的就业。但是，山东省严厉的治污行动，换来的结果却是一个行业的欣欣向荣：如今，山东省造纸业的纸和纸板的年产量占全国15%以上，经济效益连续20年位居全国第一，但COD排放量仅占全国造纸行业的5%左右。这样的结果让地方政府部门的税收得到增长，让有能力治污的企业得到发展，更让老百姓得到

了绿水青山，无疑是个多赢的局面。

无论是山东省重拳治理造纸业污染、新环保法重罚排污行为，还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关停排污企业，都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虽然在治污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税收下降、人员失业，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税收和就业都存在替代性，而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却无可替代，如何选择不言而喻。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过污染的受害者，从空中的雾霾、地里的“镉大米”到沿海的赤潮，都曾引发过广泛的

不满。我们都希望喝安全的水，吃干净的食物，呼吸没有雾霾的空气。将心比心，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治污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人们首先应该问问当地老百姓是否愿意。

治污不是为了将企业逼进死胡同，而是倒逼企业绿色发展。如今，粗放式发展早已不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污染中发展也是杀鸡取卵之举。在生态建设面前，我们应当抛开个人、企业甚至一个地区的小算盘，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加减法，才能在取舍之间更加明了。